

康有为的宗教观

——以神道为中心的考察

党蓓蓓

(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 明治维新不仅仅是一场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甲午战争后,康有为开始了对明治维新经验的研究。他所主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样板进行的。康有为关于日本经验介绍的著作或文本,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乃“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为何康有为会对日本神道做出如此评价,其背后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便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基于这一问题,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日本变政考》等相关论著中关于日本神道的言论,可以发现,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既有与前人一脉相承之处,又带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时代关心。

[关键词] 康有为;日本神道;明治维新;宗教

[中图分类号] B258, B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23)05-0109-06

DOI:10.3969/j.issn.1001-7623.2023.05.016

戊戌维新运动的主将康有为,是一位主张认真学习和汲取明治维新经验的倡导者。在“百日维新”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总结明治维新成功经验的奏疏和书籍,为中国的维新运动大造舆论。然而,以往对康有为明治维新观的研究主要关注其政治变革过程,而没有涉及明治维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宗教改革,但是明治维新不仅仅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还在意识形态领域打着“王政复古”的旗帜,围绕神道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教改革。神道不仅在幕末成为“尊王倒幕”运动的思想基础,而且明治政权建立后在日本近代国民形成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明治政府主导的神道国教化运动,就试图把神道作为国民教化和重树天皇形象的工具。

然而,笔者在阅读康有为总结日本变法经验的两本主要著作《日本书目志》和《日本变政考》,以及其他奏疏时,发现康有为几乎很少着笔介绍日本神道,甚至断言日本神道为“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1]298}。纵观先行研究,鲜有对康有为如何

看待日本神道的论述和分析。是否由于客观条件所限,康有为对日本神道本身,以及其在明治维新中的作用一无所知?抑或是否康有为基于自身既成的宗教认知对日本神道主动进行了忽略或扬弃?从中又折射出康有为怎样的宗教观?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所在。若要揭示上述问题,首先需要梳理一下康有为之前人们对日本神道的认识与理解。

一、明清士人对日本神道的认识

较早关于日本宗教情况的记载可以追溯到《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中:“倭国乱,相攻伐历年,乃共立一女子为王,名曰卑弥呼,事鬼道,能惑众。”^{[2]856}稍后成书的《后汉书·倭传》《梁书·倭国传》亦延续了“鬼道”这一说法。还有一些史书将日本的宗教信仰记为“巫覡”^{[3]170},如《北史·倭传》《隋书·倭国传》《旧唐书·倭国传》,《新唐书·日本传》。虽然上述关于日本宗教情况的记载略有不同,但均未提及“神道”这一

[收稿日期] 2023-05-29

[作者简介] 党蓓蓓,河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日本思想史,中日文化交流史。

说法,认为古代日本崇尚“鬼道”,并把神道中的原始祭祀活动,视作“鬼道”“巫觋”。

至明朝,在应对频频肆虐中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及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明朝逐渐产生了搜集客观准确的日本情报的需求,故从此时开始出现了以日本为研究对象的专著,也促使中国对日本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①。其中被誉为明朝日本研究最高峰的是郑舜功所编纂的《日本一鉴》。郑舜功在《日本一鉴》中对1564年以后日本的宗教情况做出了较为客观的描述,比如介绍了日本的创世神话、神道中的部分祭祀活动等,而这类信息在前人的记载中都是少有的,有的甚至是首次介绍。郑舜功虽然认为日本民众自唐宋以后信仰“巫神”渐少,逐渐懂得敬佛重僧、知崇文教,但全文始终未提及“神道”一词^{②20-25}。

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更多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游历日本,留下了更为详细的游记和著作。其中对日本宗教情况,尤其是对神道有着较为客观认识的有何如璋、傅云龙和黄遵宪。何如璋在《使东述略》中对日本历史民俗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考察,描述日本神道“其立教者,首重神祇,则方士之遗规也”^{[4]276},将神道与中国的方术画上了等号。傅云龙撰写的《游历日本图经》曾被康有为列举为了解日本的参考书籍。《游历日本图经》并没有就神道作单独论述,仅寥寥数语:“道教日本初谓之神教,故曰神代也。徐福受祖龙命求仙药于此,盖亦闻所闻而来欤。”^{[5]356}在傅云龙看来,神道就是中国的道教。在中国近代史上,研究日本的成果中学术价值最高的著作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在《日本国志》中,专门设有“神道”和“佛教”两个小节,第一次对日本的宗教情况做了客观、准确且系统的考察。通过对《日本国志·礼俗志》^③的考察,可以将黄遵宪对日本宗教情况的描述归纳如下:第一,日本自古以来历朝历代都崇尚神道,但至佛教传入日本后,日本佛教日盛,甚至比中国都崇尚佛教;第二,明治维新以后,提倡复古以前尊崇神道的政治,明治政府开始实施神道国教化方针,即在以天皇为中心的祭政

一致的制度下实现国民统合和教化的方针。

总结上述对康有为以前中国士人们对日本神道的考察,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种观点:(1)所谓神道,乃巫术、祭祀鬼神之类低级的原始宗教,既无教义,也无经典。(2)日本神道乃中国之道教,是中国方士之术。(3)日本一切国政皆出自神道。不难发现,除了黄遵宪之外,其他士大夫或知识分子都对日本神道采取了漠然的、认为不值一提的态度。那么在前人这样的态度和观点的基础上,考察康有为又是如何认识理解日本神道的,由此可以窥探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之前所具有的宗教观。

二、《日本书目志》体现的康有为对日本神道的理解

《日本书目志》于1896年开始编纂,1897年5月完稿,并于1898年春通过大同译书局出版发行,是一部介绍日本各科书目的工具书,是康有为关于日本研究的典型代表作之一。《日本书目志》中有许多康有为的按语,包含着他的宗教思想。所以,在考察康有为的宗教观及其对于日本宗教的认识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本。全书共分为15卷,每卷为一门,每门下又分为若干小类,依次录有书名、册数、作者、定价等信息。每小类之后,以“按语”的方式记录康有为撰写的对所列书目的评论。其中卷三为宗教门,宗教门下“宗教总记、佛教历史、佛书、神道书、杂教类”,共计列出书目108种。宗教门下共计有两条康有为撰写的按语。按照按语的顺序,首先来分析康有为在“佛书”项下撰写的评语:

日本自林胜信始倡儒学,自唐、宋以来千年,一佛国也。其所宗有华严、三论、法、律宗、俱舍、成实等。最澄始传天台,空海始倡真言,千光始传禅宗。而亲鸾蓄妻食肉,本愿之徒遂至八万余,创通新教,为天主之路德矣。其它源空念佛号,日莲唱法华,取便愚民,道并宏大,佛寺至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过于印度矣^{[1]296}。

由上述可见,康有为将日本的宗教发展脉络概括为:自唐宋以来一千余年,日本乃信奉佛教,佛教各宗派百花齐放,极为昌盛。到江户初期,由

于林胜信^④提倡儒学,日本由此进入儒学繁盛的时代。至此,康有为关于日本宗教情况的认识可谓与黄遵宪在《日本国志》中所描述的日本宗教发展脉络如出一辙。关于康有为直接参考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礼俗志》这点,还可以略举一例为证。在上述引用中康有为列出了日本寺庙的总数为“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所”。而这一精确的寺庙统计数就是来自《日本国志》中,黄遵宪在描绘佛教兴盛的局面时明确记载了当时的日本寺庙数量,如下:

佛寺之在西京者五百三十九区,统海内寺宇,禅宗一万九千三百八,密宗一万一千一百,一遍教六万七千一百,源空教十四万二千,融通派一千五百,一向派本愿门徒四万五千,东本愿门徒八万八千三百九十四,专修门徒七千五百二十,日莲教八万三千二十,合共四十六万四千九百四十二寺,可谓佛国矣。(自注:此寺数据万延元年德川齐昭所上《防海疏》,维新以来颇有减损。……元至元二十八年,天下寺宇,四万二千三百一十八区,见《续文献通考》。然尚不及日本十分之一也。)^{[6]240}

上述例证再次说明了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礼俗志》是康有为了了解日本宗教情况的一个重要思想来源。对于日本神道的看法,康有为是否延续了上述黄遵宪认为日本神道与日本国政紧密相关的这一认识呢?答案却是否定的。在《日本书目志》的宗教门“杂教类”之后,作为宗教门整体性按语中,康有为这样评论道:

合无量数圆首方趾之民,必有聪明首出者作师以教之。崇山洪波,梯航未通,则九大洲各有开天之圣以为教主。太古之圣,则以勇为教主;中古之圣,则以仁为教主;后古之圣,则以知为教主。……日人所译佛、婆罗门、耶、回之书,及《宗教进化论》、《宗教新论》、《未来世界论》、《天地熔造化育论》,瑰伟连悖而俶诡可观也。日本神学乃儒佛未东渡之前为东夷之旧俗,无足观焉^{[1]298}。

在上述最后一句话中,康有为断言日本神道为“东夷”之“旧俗”,并认为“无足观焉”。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使用了“东夷”一

词来称呼日本,这在全篇中都较为罕见^⑤。“夷”是位于华夏秩序中心的汉族对东方非华夏族的泛称,秦汉以后多指居住于中国东方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及琉球群岛等地的外族。神道是日本民族特有的宗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到了5世纪至6世纪,在吸收了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佛教、道教的某些教义或思想的基础上,才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宗教体系。然而,从康有为的按语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只看到了神道所包含的原始宗教的部分,将其理解为生活在日本地区上古先民在未开化时期祭祀鬼神之类的原始信仰,鄙其为“东夷旧俗”,不足一提。

其次,康有为轻视日本神道这一态度,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康有为对于“宗教”的理解。现代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概念是随着西学东渐才逐渐进入中国的。长期受到传统文化浸润的康有为,虽然受到当时有限西方自然人文知识的影响,但宗教观念还是基本上延续了传统的文化教养理念。这也反映出当时官方立场下知识分子面对宗教的共有感情。这种知识分子对宗教的感情略显暧昧。他们一方面重视儒家人道的理性教养,热衷于从教育和教养方面来理解“宗教”,另一方面也与现实相妥协,肯定神道设教的存在意义。戊戌变法前的康有为的宗教理解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1895年,康有为曾上书朝廷,要求遍设孔庙,以挽风俗之敝坏,救道德之沦亡,建议设立“道学科”来达到教化“愚民”的目的。他建言道:

今宜亟立道学一科,其有讲学大儒,发明孔子之道者,不论资格,并加征礼,量授以国子之官,或备学政之选。(中略)俱令独祀孔子,庶以化导愚民,扶圣教而塞异端^{[7]43}。

通过上述文本不难发现,康有为此时所说的“孔教”是指学问道德层面上的“孔教”,主张通过在科举中设立“道学科”来达到教化“愚民”的目的。

最后,上述简短按语,亦表明了康有为所持之进化论式的宗教观。他认为宗教起源于领袖人物教化民众的需要,各个时代的宗教有着不同的特征:古代重神道,近世尊人道,从神道向人道的发

展是人类进步的表现。而以“仁”为教旨,奉“仁”为宗旨的孔教才是符合时代需求的宗教。正是由于此时的康有为偏向于从教化和教学的角度来理解“宗教”,所以当他从前人那里获取关于日本神道的相关知识时,便根据自身对于“教”的理解,通过即成的思维框架的过滤,认为主要祭祀鬼神的、属于低级的原始信仰的日本神道不值一提,“无足观焉”。

然而,康有为虽然对日本神道表示了轻视,有矮化作为自然宗教的神道的倾向,但并没有否定“神道”的存在。“神道”一词在传统儒学语境中,经常以“神道设教”的方式出现。“神道设教”语出《周易·观卦》:“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8]⁸⁷康有为强调,宗教之所以要用鬼神来进行教化,是为了让百姓产生敬畏而遵从之。康有为在1898年6月19日呈递给光绪帝的《请商定教案法律厘正科举文体听天下乡邑增设文庙谨写〈孔子改制考〉进呈御览以尊圣师而保大教折》(俗称《国教折》)中说道:

夫神道设教,圣人所许,乡曲必庙,祷赛是资。而牛神蛇鬼,日窃香火,山精木魅,谬设庙祠,于人心无所激励,于俗尚无所风导,徒令妖巫欺惑,神怪惊人,虚糜牲醴之资,日竭香烛之费。而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等中国于爪哇、印度、非洲之蛮俗而已。于国为大耻,于民无少益。夫教民正俗,修礼重教,此岂细故哉^[9]⁹⁶?

在康有为看来,儒家思想中也有借助鬼神之道教化万民之说,以此来证明孔子之教不单单是讨论现世政治、哲学、教育的学说,力证儒教乃宗教,而举行祭祀便是孔教的“神道设教”之法。虽然天地万物的运转规律超出了普通人的认知范围,导致人们容易误入祭拜“牛鬼蛇神”或“山精木魅”的淫祀中。但康有为认为,即便是天地万物的运转规律超出一般人的认知,然而孔教在人类的世俗世界中早已经为“陋民”准备好了祭祀鬼神所需的一系列的祭祀仪式。“孔子之《易》,皆切人事言,后儒言天道而不言人事者,非也。”^[7]¹⁵⁵可见,康有为认为易经中的“神道设教”也是为了人事而设定的。孔子通过“神道设教”,

设计祭仪的典范来使“万众以畏,万民以服”。但康有为一方面说“神道设教,圣人所许”,承认鬼神信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却旗帜鲜明地反对淫祀^⑥,认为这种形态的神道“于人心无所激励,于俗尚无所风导”,神道应该有更好的表现方式,即文明的、礼教形式的祭祀活动。

三、《日本变政考》中所体现的康有为对日本神道的认识

由于康有为上述对待宗教和神道设教的态度,故他对于日本神道的理解,亦分为两个层面,一方面,他认为以巫祝形式进行祭祀的日本神道的内容不足一观;另一方面,他却关注和肯定明治维新过程中以礼教形式举行的日本神道形式。他对日本神道的理解,在稍后成书的《日本变政考》中,有着更为清晰的体现。戊戌年间,康有为在呈递给光绪皇帝的《日本变政考》中,一反之前对日本神道轻视的态度,从政治角度对明治维新中的神道祭祀仪式做出了积极的评价。

《日本变政考》第一卷开篇“明治元年正月元日”的项下以明治天皇携百官祭天盟誓开始,记述道:“明治元年正月元日,日皇御紫宸殿,率公卿、诸侯、藩士、贡士、征士,祭天神地祇毕,申誓文五条。”^[9]¹⁰⁵对于明治天皇率领群臣祭天发誓的行为,康有为进行了很高的评价。日本维新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五条誓约》不是向臣下发布的命令,而是采用向神的起誓的形式。对此,康有为认为,建国之初,向天起誓这一做法是既深得西法之奥妙,又可将变法纲要宣告天下,以达到统合民心的目的。康有为认为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于中国,并引经据典,远至古代先贤圣王,近考邻国日本,都是通过向天起誓的方式作为实施变法的第一步,故康有为也建议清朝皇帝应仿效,认为启动维新变法最重要的程序或是仪式便是光绪皇帝亲自广召群臣,向天下宣布变法维新,然后任用新人,实行制度改革和礼俗革命。

为何康有为会对神道所具有的“祭祀”仪式进行关注和肯定,这便要从祭祀的含义和意义开始说起。传统儒家思想中,祭礼一直被认为是治

理国家不可或缺的方略,具有重要的政治文化整合功能。而且由于祭祀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对于培养民众的秩序意识同样有着积极的意义。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礼乐崩坏”的局面,孔子便主张对“周礼”进行整理和回归,从而达到教化万民,恢复原有社会秩序的目的。康有为观察到,日本通过以神道方式举行的祭天仪式,明治政府成功地建构了王朝政治的合法性信仰,从而实现了社会政治的整合和国民的统合。这给康有为构思如何通过构建孔教来对内统合民心对外应对基督教入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而在《日本变政考》明治元年(1868年)正月元日以后的记述中,对于日本神道的相关记录则主要体现了康有为对神道国教化过程中与神祇相关机构设置的变迁的关注:“明治五年(1872年)三月十四日,废神祇省,置教部省。祭典,式部,宣教等寮属教部省。”^{[9]152}“神祇者,如吾礼部掌祭祀也。”^{[9]106}“神祇事务局。督神祇祭祀祝部神户事”^{[9]115}。“神祇官:知官事一人。以亲王、诸王、公卿、诸侯充之。余知官事仿此。”^{[9]118}

通过上述康有为对于神祇机构变迁的相关记述可以看出,首先,康有为只看到表面上相关机构的废立,并不了解其背后的曲折原委。其次,康有为是将明治政府对神道的一系列的整合,作为明治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采取的宗教近代化的措施来理解的^[10]。所以,可以说戊戌年间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关心,与其说将之视为宗教,还不如说将其视为能够促进国家和人心统合的国家仪式。故此,他忽略了日本神道所具有的信仰层面,而对神道所具有的祭祀仪式层面进行了肯定。

结语

康有为关于日本神道的认识,可以大致分为戊戌前和戊戌变法期间两个阶段。在戊戌前,康有为一方面在继承前人认识的基础上,认为日本所固有的宗教文化——神道乃“儒佛未东渡之前为东夷之旧俗”,是具有巫祝性质的,既无经典又无教义的原始宗教,不值一提,有矮化作为自然宗教的神道的倾向;另一方面,在康有为这一阶段侧

重于从教化、教学等方面理解“宗教”,使得他接触到日本神道的相关信息时,将既成观念自动套入了对日本神道的理解中,采取了轻视的态度。然而,康有为并不反对“神道”,他在承认鬼神信仰重要性的同时,旗帜鲜明地反对淫祀,认为神道应该采取文明礼教的祭祀形式。在戊戌变法时期,随着康有为对日本研究的深入,他对明治维新过程中以文明的、礼教形式举行的日本神道的祭祀仪式进行了关注和肯定。尤其在《日本变政考》中,康有为对于日本神道的关心,与其说将之视为宗教,还不如说将其视为能够促进国家和人心统合的国家仪式。这一认识也对后来康有为将孔教宗教化,甚至将其树立为国教的这一思想回路有一定的影响。

(本文由“日本哲学与宗教思想”学术研讨会暨中华日本哲学学会2020年年会所发表论文修改而成)

注 释:

- ① 明朝以前,中国一直都没有独立地论述日本情况的专著,一般都是以“东夷传”或是“日本传”的形式作为正史编纂的一个环节出现。而且这些被记载在正史中的日本相关的信息主要是以传闻为主,缺乏可靠性。另外,关于明朝的日本研究,可参考武安隆、熊达云编撰的《中国人的日本研究史》(六兴出版,1989年)。
- ② 参阅郑舜功《日本一鉴·穷河话海》(卷一),1939年影印版。
- ③ 《日本国志》全书共分40卷,根据日方文献资料编写,其中包括描述史实的“本论”部分和以“外史氏曰”形式记载黄遵宪自己见解的“评论”部分。
- ④ 林罗山,名信胜,江户初期的儒家,幕府儒官林家的始祖,曾大力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
- ⑤ 仅在康有为早期提到日本时偶尔用到。《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中《论时务》(1888年10月)中使用过一次。“日本崎岖岛夷耳,而近年岁所出金钱……反用东夷西戎之朔,此诚执政者之羞也”。《康有为全集》中仅有这两例用“东夷”称呼日本。
- ⑥ 《礼记·曲礼下》:“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凡是不符合礼制规定的祭祀,皆被称为“淫祀”。

[参 考 文 献]

- [1]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2] 陈寿. 三国志:卷三十 [M]. 陈乃乾,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2.
- [3] 王宝平. 神道与日本文化 [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
- [4] 王锡祺,编.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十帙·第四卷 [M]. 上海:上海易著堂,1891.
- [5] 傅云龙. 游历日本图经:文学 [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6] 黄遵宪. 日本国志:下册 [M]. 钟叔河,主编. 长沙:岳麓书社,2016.
- [7]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二集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8] 国学经典:周易译注 [M]. 韩立平,译注.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8.
- [9] 姜义华,张荣华,编校. 康有为全集:第四集 [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 [10] 小林寛. 康有为における「神道」把握 [J]. つくば国際大学研究紀要,2008(14).

KANG Youwei's View of Religion —An Examination Centered on Shintoism

DANG Beibe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China 071002)

Abstract: The Meiji Restoration was not only a reform of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ystem, but also a series of religious reforms centered on Shinto in the ideological field.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Kang Youwei began to study the experience of 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the Hundred Days' Reform led by him was mimicked after the Meiji Restoration. However, Looking through a series of Kang's writings or texts about his Japanese experience, it was found out that Kang Youwei seldom wrote about Japanese Shinto, and even asserted that Japanese Shinto was "an old custom of Eastern Barbarians, which is not worth mentio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wo questions, 1. Why did Kang Youwei hold such a disdainful view of Japanese Shinto. And 2. what kind of religious view was behind it. Kang Youwei's "Japanese Bibliography", "Japan's Change of Government", and other related writings on Japanese Shinto, are analyzed and used to clarify Kang Youwei's view on Japanese Shinto. It shows that Kang Youwei's understanding of Japanese Shinto is not only in line with his predecessors, but also with his own unique perspective and concern.

Key words: KANG Youwei; Japanese Shinto; Meiji Restoration; religion

【责任编辑 张晋海】